

有关马戛尔尼使华的几点思考

邓海成¹ 霍晓敏²

(1.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2.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文章从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话语问题谈起,探讨了18世纪的世界形势,比较了中日印三国所走的不同路径及结果,对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是殖民陷阱还是历史的良机,乾隆是洞悉其奸还是维护天朝体制,前清是禁传宗教还是禁传西学等问题,文中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马戛尔尼;使华;使团;中英关系;西学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06)02-0101-04

一、话语问题和18世纪的世界

对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形成有以下几种解释模式:近代化论、文明冲突论及朝贡礼仪说等。这些观点认为18世纪的中英关系是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1](P1-4)}对此有人提出质疑,因为这些模式都在用当代人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或衡量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在苛求古人。于是在上述众多的话语背后不断涌现出不同的声音,其中以美国学者何伟亚最为代表。他提出从帝国构建的角度来重新阐释马戛尔尼使华时的中英关系。何氏认为中英在18世纪是两个扩张性的帝国,英国试图用西方“主权平等”观念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在中国看来世界呈现的是“差序包容”的格局,所以没有平等可言。^{[2](译序 P25)}双方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从而导致了马氏的失败,帝国构建引起的冲突,使得平等交往的期盼成为历史的泡影。

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马氏使华的解释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站在近代化或文化、文明冲突

的立场,是不是在苛求古人?由帝国构建的视角出发,是否就不存有苛求古人之嫌?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话语是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对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罢了。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是就文学角度而论。史家应该对历史有个“真了解”,再还其以本来之“真面貌”。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对历史有个怎样的“真了解”而还其以原始的“真面貌”?史学泰斗陈寅恪说:“与所论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3](P247)}就是要回到历史,条分缕析地考察历史,方可评断古人之成与败。胡适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宋代以来”这个一千年当中,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当中,一个潮流、一个部分、一个时代、一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时代。”^{[4](P286)}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氏使华也不过是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只是这一趋势在新航路开辟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不管是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

收稿日期 2005-05-10

作者简介:邓海成(1980-)男,安徽巢湖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阶级,抑或哪一个人,在这个人类必然的过程中,都得时刻提醒自己“居安思危”保持与世界同步。

在全球的视野下从多维的角度来分析,18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具有怎样的形势?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爆发,英国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疯狂寻找海外市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除了带给非欧洲地区先进的工业制成品外,更重要的是带去了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科技文化;除了经济上不停地抢夺占领亚非落后地区外,文化上也不断地冲击着这些地区古老的民族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谁能撇开这个趋势,另开一片属于自己的纯净天地而傲视全球?闭门造车就是否定历史否定自己,因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然而马氏使华时,乾隆对此却视而不见,采取的对策及其后实施的措施是不适世宜的。他没能主动求变,积极调整政策,创造有利条件。所以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¹⁹(P26)

二、殖民祸水还是历史良机

18世纪的历史趋势要求身置其中的每一主体,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对策,漠视回避等于坐以待毙,结果只有被蚕食被殖民,甚至文化的断绝和民族的消逝。马氏使华给中华帝国带来的是殖民祸水,还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乾隆拒绝马氏是捍卫主权的正当抵抗,还是错失踏上近代化康庄大道的历史良机?

放眼寰球,处于相同背景下的不只一个清政府。就亚洲范围而言,有大山之隔国土接壤的印度,有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日本,他们选择的发展路径及结果同清政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大胆请进来,敞开大门和西方商业往来;后者由闭关保国,进而又主动走出去迎接挑战。结果印度被肢解沦为殖民地,日本通过自醒自新走上近代化道路。

国情是一国制定实施对外政策的基础,列宁也说过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具体到18世纪同一国际背景下中日印三国的不同选择,是由各自怎样的国情决定的呢?

首先,印度在历史上自古就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等复杂的矛盾。18世纪英人未来之前,印度尚处于大莫卧儿帝国统治之下,精明能干的君主和强大有力的帝国,使得国家机器运转的还算灵便。但奥朗则布死后,帝国则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中。军队整天沉湎于奢侈享乐,奢糜腐败直接导致战斗力的丧失,行政官员不再效忠服从,国家财产不

断被世袭侵占,穆斯林和印度教间矛盾表面化,战争时有发生。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被彻底打乱,印度分裂成两半。恰在此时,英人赶来了,国家的分裂为英人的征服铺平了道路。所以布罗代尔说:“一切的根源都出自它(印度——引者注)的迁就和软弱。”¹⁶(P574)在此,布氏显然在为殖民主义作辩护,但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印度的被征服和被殖民除了外来的压力,其自身的弊病是根本的。

其次,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颁布过禁海令,可是在短暂的禁海后,德川吉宗幕府时开始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在此期间,“兰学”开始勃兴,西方事物被大量的引进,大批家臣被派出外采集先进的西方知识,如订购图书、器械以及优良动植物种等。同时,虽明令禁止西教,然并未禁止西学,相反却用西方科技文化来补充其“圣学”,维护巩固封建统治。这种吸纳西方先进事物的气魄与胸襟,试问,同一时期的清朝统治者有谁可与之比肩?因此,日本很快将西方的不平等条约统统丢进太平洋,并不再追随中国,而走西方发展道路,成为亚洲第一个迈入近代化的国家。

然而,面对全球大变革的历史进程,沉浸于“康乾盛世”里的清政府选择了什么?我们不能说它是闭关自守的,因为毕竟还有个港口商船如织,一直从事着对外贸易。也不能说是对外开放的,因为仅有的小窗口依旧被顽固地钉上了许多不合适宜的条规。准确地描述满清政府此时的对外政策,用朱雍先生的“限关自守”来形容比较贴切。¹⁷(P304-305)这个选择是清政府做出的,处于那个时代站在那种立场,做如是选择有其相对进步性,应该给予肯定。然而,成功取决于在一个特定时代中是否赶上机会以及反复和接连遇到机会,国力同金钱一样是可以积累起来的。¹⁸(P37)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清朝政府,对马氏来华这种历史机遇却冷漠地淡然处之,致使错失了搭乘近代化列车的一次绝佳契机。清朝选择了与东西二邻不同的第三条道,结果中国沦为“两半”社会。可是能就此断定这条道路走错了?能说敞开心怀就是引狼入室,主动出击就是顺应潮流,紧锁国门就是闭关自守?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却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国情。诚然,事后诸葛亮是要不得的,然而这些问题人们仍旧在苦苦不断地思索着。

三、洞悉其奸还是维护体制

乾隆拒绝马氏六项要求的原因,是出于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和法度,还是洞悉了使团秘而不宣的霸权图谋?

首先在礼仪上,乾隆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天朝礼

仪制度的，虽然在使团刚入华时曾表示出一定的宽容和灵活。乾隆曾批示：“接待远人之道，贵与丰简适中，不卑不亢。若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对征瑞派道将过贡船取表文和贡单一节，他认为：“所办又未免太过……殊属矫枉过正。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¹⁹(P137-138)然而，为体现天朝物产的丰盈和文化的优越，实现对外藩蛮夷的防范和制衡，乾隆又颁布谕旨：“如该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²⁰(P147)可是马氏的固执激怒了乾隆：“（使臣）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甚为不愜……（地方官）款待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等妄自尊大。”认为：“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待。”²¹(P170-171)所以“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并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²²(P427-428)

由上述内容可见，乾隆在礼仪上先前看似灵活的态度，仅仅是为了防止接待过简或是过优，而“转为（其）所轻”；仅仅是因其初来天朝而又航海远行，应当格外加以体恤“以示怀柔而符体制”。²³(P137)或者说这只是他驾御远人的一种惯用方法罢了，只是其“丰简适中”策略的外在形式而已。所以说乾隆在礼仪上是不曾退让或是放松要求的。

其次在礼品上，应该承认马氏采用的标准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精致、精美、实用的工业品除炫耀英国先进的科技文化外，还在有意彰显其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霸权。马氏在礼品清单上说：“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礼品有）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00门的‘君主号’战规模型，以及‘削铁不卷口的利剑’……”²⁴(P84-85) 克兰默宾在评价马戛尔尼时说：“他‘有意识地以大英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与成就来面对当时显然处于其力量与繁荣顶峰的中华帝国。”²⁵(P12)所以在礼品上使团是自以为是的，他们认为的新是相对的，这是使团在礼品上的失误或自大的表现。

尽管如此，乾隆及其愚臣们对礼品的认知或理解是否完全正确呢？答曰：否。乾隆认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²⁶(P139)而“所有安装不能拆卸之说，朕意必

无其事，自系该贡使欲见其奇巧，并表伊国王诚敬之心。”²⁷(P152)清廷工匠奏称（英方所进）“天球一件，地球一件，……与宁寿堂现安之天球地球无别。地理运转架一件，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同，而坐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又玻璃灯二件，……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顶玻璃灯无异”。²⁸(P221)乾隆认为：“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²⁹(P11)其结论是“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³⁰(P139)而这些东西好的足以逗乐小孩子，终以“天朝不贵奇物，……更无需与尔国制办物件”为由拒绝了马氏。³¹(P185)

我们说，清廷上下对礼品评价是不公允的，或是不客观的。他们注重的是礼品的外在表现——样式色泽大小，对其深层内涵——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却视而不见。或许乾隆意识到了中英间的巨大差距，只是他不可能做到坦然面对之，反而为了挽回天朝的面面，对使团的要求一概加以言词拒绝，并在礼仪上坚持到底。

总之，笔者认为事件发生时，马氏想尽力塑造出大英帝国的先进形象，乾隆欲竭力保持住中华帝国的天朝威望。由于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冲突的发生交往的失败，而并非是乾隆对马氏来华用意的洞悉，他只停留在维护天朝体制这一浅显的层次上。

四、禁传宗教还是禁传西学

乾隆虽拒绝了马氏，可是在对待西方科学文化上，他是西学带头人还是扼杀西学的“刽子手”？

首先，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了历朝历代的巅峰，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掀起的全国范围内查禁书籍的运动。鲁迅说：“文字狱加上钦定四库全书使得天下之书‘无不加以取舍……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³²(P63)应该承认在统治的初始阶段，文化专制是有利于巩固统一的。但等到中后期，文字狱的泛滥则显示了专制力量的日益羸弱。尽管乾隆后期由于多种原因文字狱案有所减少，可这一毒瘤对思想文化发展的阻滞作用，这一愚民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可能一时间彻底消除。在文化专制的恐怖阴影下，文人学士们如履薄冰只求明哲保身，不敢发挥聪明才智，更不敢过问评议政治，只能将精力转向故纸堆，反倒促使以训诂考据为特点的汉学的兴起。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何以谈西学谈借鉴求发展？

前面提及乾隆评价礼品时说，东西好的足以逗乐小孩子，帕克透镜也仅成为和珅口袋里笨重的打火机。其实仅非如此，其父雍正给年羹尧的硃批中

说：“今有新进三种小规矩，甚如意，寄赐与卿，以为玩具。”^[13](P23)这个玩具却是伽利略发明的比例规。这种将西学的产物当作把玩之物而用于享乐，对西学的精神加以禁传而拒于国门外的态度，是不可能平等的基础上谈借鉴以求发展的。邹振环在编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时，就没能选出一本康乾时代的作品。作者认为译作入选的标准首先在于它是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所谓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的。^[14](前言P2)在此我们不是探求其标准合理与否，至少能够证明一点，就是在这一期间没有能够出现一本对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力作。诚然，民间存有介绍西方和西学的著作，但是那只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更谈不上产生社会影响了。

其次，留用传教士问题。从明末万历到前清乾隆之间，历届统治者对于西学采取的政策可以归结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15](P1136)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尽管康熙曾明确表示：“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16](P150)然而有一技之长的教士留作何用？难道让他们大力传播西学？答案又是否定的。一来，虽然禁传宗教而不禁西学，但技能却仅仅用以满足皇室生活之所需，并非传至民间用于民间。二来，教士留在中国大多因其一技之长而供职皇宫身居官府，整天观天象测吉凶，查历书核历时，出入自由都是问题，根本无从对外界形成影响。例如，乾隆时期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郎士宁、蒋友人和王致诚等，他们一般都精通于绘画或是钟表器械维

修。建设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时，众多传教士就曾参与了设计和建造工作。他们要么是御用画师，要么是宫廷维修工。

试问，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能够将其所学之技能传于何人？更何况留用传教士的目的并非为了西学，仅仅是利用西洋的文化、利用传教士的技能为其生活享乐服务。可以说，乾隆朝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艺术活动是远远超过其科技活动的。所以，留用教士不能说明其重视西学。总之，不论康乾之际在禁教时是否明令禁止西学，但就其客观效果而言，禁教的结果是有意无意的对西学产生了一种阻碍，西学在禁教的影响下不禁而自禁。

综合上述内容，笔者认为，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上看乾隆末年马戛尔尼使华事件，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马氏来华不是东流的殖民祸水，而是历史赋予的发展良机，乾隆却冷眼相对视而不见，沉浸于“乾隆盛世”的天朝迷梦里，一味强调“保泰持盈”，他并非洞悉其奸，而是顽护天朝百余年的体制，使得中国丧失踏上近代化道路的一次历史契机。诚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选择生存、发展方式的理由。可是，18世纪的全球早已开始了全面的重新洗牌，新的游戏规则也正在创立之中，新的特权阶层、制度和结构正在兴起重组。在这样的变局之中，一味坚持本土化死守传统，只会被先进的势力抛弃、被历史的巨轮碾碎。只有通过不断的接触、比较、包容和借鉴，才能创造出顺应时代的先进文化，民族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融会贯通而不间断地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 [1] (法)阿兰·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撞[M]. 王国卿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
- [2] (美)何伟亚.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 邓常春译，刘明校.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4] 胡适.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A].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 新文学运动[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7] 朱雍. 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外交与中国命运[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 [8] 清实录(第27册)：高宗纯实录(19)[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万明.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前清海外政策比较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0] 张顺洪. 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J]. 近代史研究，1992，(3):1-16.
- [11] 张芝联. 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12] 鲁迅.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A]. 鲁迅全集(第六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13] 吕万和，罗澍伟. 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J]. 历史研究，1981，(3):18-30.
- [14]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 [15]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 吴伯娅.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